

时时熏吹，给人以灵感和激励。这也许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大学，但始终还有几个全国都承认的一流的专业，有时还能够做出一流成果、培养出少数一流学生的原因吧。愿研究部之灵永存。

## 【纪念文章】

# 人看我看我们

——读费孝通译著 *Earthbound China*<sup>1</sup>

于长江

中国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源自于19世纪末试图引进西方社会思想解决中国困境的努力，这种理论渊源与现实对象的分离，使得中国的学术，始终摆脱不掉西方中心的影子——引进、照搬、争论、修正、吸收、批判、否定、赶超、再引进……人们似乎一直忙于“西学东渐”过程中学术对象和范式的适应性转换。但另一方面，中国学术又不断生成自主独立的冲动，比如30年代，社会学界吴文藻先生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反映出当时中国学术界反思和力图改变现状的心态——希望基于中国社会经验和现状来确立自主的主体性的学术取向、兴趣、标准和范式，不仅要把各种思想从西方引入到中国，还要把中国的学术经验，反过来输出到西方。

在30、40年代的诸多学术著作中，费孝通和张之毅先生关于“云南三村”的研究报告，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三个报告本来用中文写成，后来由费孝通先生编译成英文，在这种语言和读者的转换中，体现出中国学术面对的这种“中-西”二分的境遇和中国学者的努力，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学术的特殊本质和当前中国学术主体性的构建，具有一定意义。

## 一、东西方之间

费孝通先生晚年非常关注世界上不同文明、文化之间交流理解的问题，提出“文化自觉”和“美美与共”的思想。作为一个实践取向的学者，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考，从来不停留在纯粹思辨想象阶段，他提出的各种命题，永远伴着可能性和可行性的考量。跨文化交流也是一样，费孝通先生其实一直很强调这种交流的现实操作性，而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理念和理想。

费先生本人的成长过程，就已经包含着这种跨文化交流、沟通和“美美与共”的因素。从童年开始，他就生活在一个具有中外交流背景的家庭，很早就开始接触这种中外文化的互动。费先生的父亲费璞安曾经留学日本，从事教育工作，姐姐费达生也曾留学日本，这些家庭成员的经历，对费孝通必然会有一些影响。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期间，费孝通全面加入到这种跨文化的学术引进工作中，他师从派克、史禄国，接受和吸收大量西方理论、方法论和方法，同时也把某些中国经验，反馈给这些导师，尽管这部分文字记录不多，但可以确定的是，费孝通在赴英国学习之前，就已经相当熟悉西方学者的学术规范和思维习惯，并开始从事中西学术之间的“翻译”工作。

留学英国期间，他本人不仅学习和吸收西方学术思想，也开始把他自己在中国“江村”的研究，编译成博士论文，介绍给西方学术界。此后，他又几次从事这种学术翻译工作，把一些深刻反映中国社会经验的思想成果，译介到英语世界中。这种翻译，不仅是文字转换，也包括着思想和经验的广义的“翻译”过程，它构成费孝通先生学术生涯一个重要的方面，尽管这方面论者不多。在费孝通先生以及其他学者努力下，关于中国乡土社会的几部重要著作均有了英文本，其中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本来是用英文写的 (*Peasant Life in China*)，后来才翻译成中文 (1986年)；《乡土中国》原文是中文，后翻译成英文 *From the Soil* (1992年)；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所谓“云南三村” (实际上是《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的合称) 和《昆场劳工》，原文是中文，由费孝通先生本人翻译成英文，*Earthbound China* 和 *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这两本书的内容，集中反映了费孝通如何面对英文世界来表述中国学术经验的。此外，费孝通著作的英文版还有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Prospect and Retrospect*、

<sup>1</sup> 英文是 *Earthbound China*，中文译本书名为《云南三村》



*China's Gentry, 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 Chinese Village Close-up, Small Towns in China* 等等。这些作品中,《云南三村》改编为 *Earthbound China* 的过程,集中体现了这种跨文化学术表达的一些特点。

## 二、“双向”的意义

在中西学术交流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能否构成真正意义的“双向”交流。欧美学者长期主导国际学术领域,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学术研究起步较晚,几经波折,很多方面还处于积极引进学习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下,真正的“双向”是否可能?

从历史经验看,双向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具体操作方式。比如20世纪30年代英美学者与中国的学术交流,并没有形成中国学生一味崇洋或盲目出国等片面的流向,而是出现了积累本土经验的高潮,其中原因之一,在于当时来华的西方学者,是以正常的授课教师的身份来华,承担具体的课程,定位适当。比如派克讲学,就是以“教师”的身份和行为,并不渲染炒作“大师”、“泰斗”之类高深莫测的光环。他只是按照正常要求授课和组织实习,不是抽象宣讲概念理论,而是具体指导和带领同学参与实地研究,在实践中讲授“参与观察”等方法,帮助学生理解芝加哥学派社会学、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取向。中国学生不是单方面接受抽象的、脱离现实的“理论”,而是同时收集、积累本土经验……这种中国经验和西方思想方法的结合过程,构成了当时青年学生师从西方教师的一个重要惯例。当时费孝通等学生在派克讲学后,没有急于到美国芝加哥去“朝圣”或“取经”,而是热忱地、不计牺牲地奔赴全国各地从事田野调查,这种由西方教师教学唤起的更为强烈的面向本土的冲动,奠定了当时与西方学术交流的一种重要的心理基础,它对今天的学术和教育发展,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某种意义上,1940年代魁阁时期的社会研究,代表着中国在吸收西方学术方法和思想并进行消化吸收之后,开始形成独立的学术主体性,它包含着中国学者特有的处境所激发的特有关注、特有学术动机等等,已经构建起某种独立的研究范式和思想传承。事实上,只有在这种独立的主体意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跟“国际”进行有意义的双向交流。费孝通在 *Earthbound China* 的前言中,罗列出他和他的同学们田野工作的成果,又特别阐明中国当时艰难的战时状况和物质条件等,实际上凸显了中国学术独一无二的属性;以此为平台,才能正常地面对英美读者和学术界。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学术主体,就很难与别人进行“交流”,只可能是单方向的灌输或获取,充其量也只是形成一种简单的类似上游和下游产业分工的格局。

因此,魁阁精神包含一种跨文化、跨国家的双向交流的潜质。魁阁学术,首先是由西方学术方法论和方法“激活”的,但它在基本认同和兴趣取向上,又是地道中国的。作为背景的,就是在当时正在进行的惨烈抗战——中国处于绝对劣势的、胜负难料,而大批学子在欧美学成,不假思索地经历种种艰辛,辗转抵达中国政府控制的相对贫困边远的“自由中国”<sup>1</sup>,这个事实本身,就构成中国学术的某种重要基础。而费孝通先生对魁阁学术成就的译介,正是把这种生成于中国的独特的学术清流,反过来注入相对成熟和庞杂的西方学术界,成为国际学术共同的精神财富。

## 三、从“三村”到“China”

1944年费孝通先生访美期间,把魁阁期间田野研究形成的三篇相对独立的中文报告《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合起来,编译成一本英文书,取名 *Earthbound China*,由1945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中国学者和学术走向英语世界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这本书并不是前三篇报告的简单直译,而是一种典型的“编译”,除了保持基本事实部分之外,其他内容和分析探讨部分,都作了很多增删和调整,使之与英语世界的语境相适应。

*Earthbound China* 的开篇,是费孝通写的一个“前言”;正文的第一部分,是一篇“介绍”,书的末尾,是一章“结论”,这种方式,固然是一般西方学术著作的通例,但是在“中国-西方”特

<sup>1</sup> 1944年出版的《昆厂劳工》英文版 *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 的封二封三就印有战时中国“敌领区”、“自由区”的地图。



定的学术场景与内容的转换中，这种“前言”、“介绍”、“结论”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们担当着一个跨越学术文化背景的桥梁。事实上，对于从中文译介到英文世界的学术著作而言，这些总结概括类的章节的重要性，决不低于作品的内容本身。尽管这些著作的著者——费孝通和张之毅——实际上已经是融汇西方思想和中国经验的学者，但他们原来的中文报告，不可避免地具有中文背景影响，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语气上，会反映出一些以国内读者为假设对象的特点。它们在转换成英文后，针对新的读者语境，形式和内容都要做出相应调整。

比如，原来《云南三村》中《禄村农田》有一个“导言”，《易村手工业》有一个费孝通写的“序”，和一篇张之毅自己写的“调查的经过和方法”，介绍研究主旨、过程、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等，可以说是报告内容的提炼和升华，而这些本来分散在不同报告中的内容，在 *Earthbound China* 中，被重新调整编译在英文版“前言”、“介绍”和最后一章“结论”中。

目前常用的中文版的《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是中国社会学重建后出版的，其中最后一篇《玉村的农业和商业》经过张之毅先生大幅改写，与40年代版本有很大不同<sup>1</sup>，费先生的序言写于1987年，是一篇温故而知新的文章，通过回顾一些旧事，特别是关于魁阁和张之毅先生的回忆，重点讲这本书相关的社会背景、调查过程、当时人们的活动、心态和精神风貌，特别表达了对张之毅先生的深切怀念。这篇东西的对象，90年代中国社会学重建过程中的相关人士。

*Earthbound China* 出版于1945年，当时的中文原稿，与上述新版的《云南三村》已经有一些差异，但前两篇的内容基本相同。通过中英文对比，可以看出费先生面对不同社会文化读者的表述方式的不同。针对不同语境，论述的顺序、重点、结构、框架、用语等表达方式都做了一些调整。

费孝通当年面对英文世界，把三篇报告合成一篇，又作出各种调整安排，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从“中国”到“国际”的转换。当人们观察事物的参照系的边界仅限于“中国”范围内的时候，这三个村庄，就代表三种基本的乡村经济类型，其侧重点，在于不同类型之间的差异和比较；然而，当这些内容被译介到英语主导的国际社会之时，参照系发生全面转换，视野的范围放大了，从中国扩大到“国际”，这时这三个乡村首先被共同视为“中国”的地方性经验，统一在一个共同的“中国性”（Chineseness）之中，并不可避免地纳入“东方-西方”二分的参照系，而它们之间的差异，则成了次一级的问题……，因此，在用英文同西方读者探讨云南三村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种参照系的变换，同时考虑到西方人的视角和认知习惯，使得西方读者面对这些知识的时候，能够找到一条介入的路径。

## 四、帮助西方想象中国

### 1、战争和贫困

*Earthbound China* 的前言中，费孝通先生并不是仅仅介绍这三个个案研究的来龙去脉，而是从东西方交流谈起（类似于今天的所谓“全球化”概念），介绍中国学术活动的大背景，包括中国一代青年学者田野调查的努力，特别详细描述了抗日战争状态下，未被日本占领的“自由中国”区域内极端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顽强努力<sup>2</sup>。这些内容，对于当时中国读者来说，无需介绍，因为中国人正身在其中，感同身受，但对于英美读者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依照美国人对待国际事务的习惯和美国媒体运作的状况，当时中国进行的反对日本入侵的殊死战斗，对一般英美平民来说，不过是遥远世界的某个新闻而已，并不会造成太深刻的印象或吸引太多人刻意了解，更谈不上设身处地的共感、共鸣了。因此，这种现实，必须作为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背景加以特别介绍。同时，即使没有战争，中国平均低下的经济和物质条件，也是美国大多数读者难以想象和体会的，而不理解这些方面，也很难理解中国学术的基本社会背景。具有长期中西方交往经验的费孝通先生很清楚，中国学者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或高估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和关注。在现实交流中我们必须假设，一些中国人自己视为熟视无睹、路人皆知的东西，对美国人可能恰

<sup>1</sup> 费孝通、张之毅，1990，《云南三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3-4页，2页。

<sup>2</sup> Fei Hsiao-tung, 1975,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Midway Reprint. vii 页, x 页, xii-xiii 页。

恰是闻所未闻的信息，非常有必要主动详细的介绍。

## 2、从读书到田野

面对新的语境，关于研究方法的介绍，也不能仅限于一般欧美的方法和过程，因为经验研究方法，在中国和在美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必须以某种方式说明白。在中国，这些方法首先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产物，是来自异文化的东西。广义地说，发展现代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就是跟中国传统思维习惯的一种分离<sup>1</sup>，这对中国学生和学者来说，是一种特有的心路历程，具有一种深切的心灵体验——接受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感受，改变一些自己熟悉、亲近、自然的东西……对有些人来说，不亚于一种精神洗礼，也伴随着很多痛苦和张力。对于这方面，西方一般读者是很难自己想象得到的，但是不理解这种学术心态，就很难理解中国学术界的特点和现实，也很难理解中国学术与社会的真正关系，因此，所以必须做出特殊的明确地说明。费先生在前言中，特别指出了这个问题，即中国学生在学习西方社会科学中，很大一个难点，在于方法，而不是内容。比如说，中国学生过于偏重读书，而且有某种“读死书”的倾向，这种倾向，不适合现代社会研究。这种对书的态度，不管读什么书都存在，即使是读西方的书，也会倾向于读死书，而西方田野调查方法的输入，是对这种读死书的习惯的一种颠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变化和启发<sup>2</sup>。这些知识，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交待。它有助于西方学者了解中国新一代学者实际上完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转变，具有怎样的开创性。也揭示了中国社会激烈转型中，学术界的转型的力度。

## 3、国际处境

1940年代中国与国际学术对话的另一个重要支点，是中国极为特殊的国际处境。中国学者的云南三村研究，是在中国殊死抵抗日本入侵的战争时期克服重重困难和危险完成的，目的在于为现实抗战和未来建设寻找出路。正是中国迫在眉睫的亡国危险和抗击外来侵略战争的惨烈，深深刺激了中国学者对于自己国家民族的忧患与责任，激发了中国学者深入研究中国、理解中国和尽快制定出中国发展蓝图的强烈冲动。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现代化和发展问题，中国就永远摆脱不了这种岌岌可危的处境。中国学者的这种救国救亡的情怀，是西方学术界不易理解和体会的，因为这些心理，只能发生在一个绝对弱势而又不甘屈服的国家的国家中。那些正在主导着世界的西方强国不存在这种处境，它们即使遭遇另一个强权入侵，也不会因此而产生“研究本国社会”的热情——这是完全不同的机制和不同的境遇的产物。而中国当时的魁阁，就象征着这种弱势民族学术研究的特有精神品质，而对于这种精神的概括、表述和交流，也是当时中国和西方之间沟通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本身就是中国学术不同于西方，又可以贡献于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和亮点，同时也构成了考验译介者跨文化表达能力的一个难点。费先生在前言中，辟出相当一部分篇幅用于这方面的介绍<sup>3</sup>，足见其良苦用心。

# 五、双重挑战：阐释中国乡村工业

## 1、基于传统的新思维

“三村”研究最重要的成就，是重构中国社会中“工业”与“乡村”的关系。费孝通等人试图打破一般西方工业化的模式，不再从“工业”与“乡村”之间的互相对立、零和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而是从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农工相辅”的格局出发，构建一种中国本土的解释模式。其要点，在于把乡村中的“农”与“工”的关系，看作一种根本上互补的关系。千百年来，男耕女织，二者本来就是协调的关系，功能上是互补的，只是近代由于西方新技术的出现，特别是分

<sup>1</sup> Fei Hsiao-tung, 1975,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Midway Reprint. viii 页

<sup>2</sup> 同上。

<sup>3</sup> Fei Hsiao-tung, 1975,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Midway Reprint. xii 页, 311-312 页。费孝通、张之毅, 1990, 《云南三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3-4 页, 222 页。



工的、集中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模式强行打入中国，破坏了中国传统的农工秩序，才使得这种协调出现了某些破绽。因此，要理解中国现代的工业化，特别是农村与工业化的关系，就应该充分考虑到这种本土社会千百年来一贯的传统产业秩序，这就是真正的中国历史和现实经验。依照这种思路，在农村中，农业和工业等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如何重新回归“协调”的问题。

当时费孝通所代表的这种学术思潮，是基于“救亡”理念的现实研究的一部分，它强调乡村农业、工业之间的协调和互补性，并把这种理想化的互补关系，扩展到整个农村和城市工业的关系，进而提出中国战后工业化的特有模式，那就是在城市集中全力发展现代重工业（战争的经历，使大家一致认同中国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观点），同时把某些轻工业和现代工业中可以外包分散生产的部分，都安排到乡村，使乡村传统的工业生产能力，成为国家发展现代重工业的支持与补充，而不是障碍或牺牲品。

这些设想及其背后贯穿着的城乡协调、工农协调的思维，与中国或西方主流社会的思路都不相同，甚至难以沟通。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等人并不是把这种思路视为一种“制度创新”，而是认为它来自对中国社会和传统的更为准确的把握，他们把这种更为深刻地认识，归因于真正高质量的田野研究。正因为如此，它不是来自任何现成的理论或学说，而是来自现实。这也解释了这种思路的独特性和一般性之间的统一，它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没有盲从一些长期被视为天经地义的集体-共同幻觉。

然而事实上，这种思考，当时不管是在一般社会主流还是学术思想界，都是有些另类甚至逆向思维的，所以，当时这类学说不管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西方学术界，其表达都会遇到很大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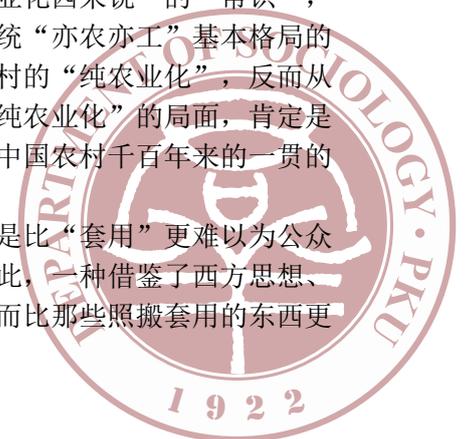
## 2、独立思想的困境

费孝通等学者在“三村”研究中提出的关于中国乡村产业、乡村发展的基本概念和思路，事实上等于对“中”和“西”两方的常规思维同时提出挑战。它一方面质疑西方视为理所当然的各种关于现代化、城市化、城乡关系的基本认知，暗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不必要或者不应该被强行肢解和纳入基于西方社会历史经验的那些“工业化”、“城市化”分析框架中；另一方面，这种思路也不同一般中国人对于城乡关系的理解。

中国社会更深层的问题在于，19世纪后西方的强势入侵不仅在社会和物理层次上造成了一种看似“工业-乡村对立”的事实，而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西方工业扩张，各种与这种“对立”相应的社会思想也大量涌入中国，占据人们的头脑，主导话语权威。除了极少数彻底的所谓“顽固派”之外，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管是民众还是社会精英——都几乎不加思索地、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种“中-西”之间、“农-工”之间二分对立的思维方式。这种体系，实际上已经成为支配中国人基本思维的基本概念范畴，不管何种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到20、30年代，这种套用西方概念的想法和做法似乎变成一种“常规”和“常识”，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然而在批评者眼中，这表明对于中国社会的误读或曲解已经形成一种稳定的共识，构成一种错误的“传统”。

而30、40年代费孝通等社会学者“三村”研究中所要质疑和挑战的，恰恰就是这种“理所当然”的思维习惯。这就决定了三村不管是中文版，还是英文版，都面临着中西两方面的冲撞和压力，这是一种中国学术特有的双重跨文化的困境。首先，要打破“工业化西来说”的“常识”，澄清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实际上是（指少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农村传统“亦农亦工”基本格局的延续，这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一贯传统，不是在什么新现象；而中国农村的“纯农业化”，反而从来就是一种例外的、短暂的、特殊的历史现象。每当中国农村出现“纯农业化”的局面，肯定是农村凋敝、解体、动荡甚至崩溃的状态。“纯农业化等于贫困化”是中国农村千百年来的一贯的现象和规律。

对于三村研究报告中文版而言，表达的难点在于，独立的认知总是比“套用”更难以为公众接受或理解。鉴于“照搬和套用”已经成为一种相因成习的成规，因此，一种借鉴了西方思想、但又不“照搬”西方的关于中国本土的认知，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反而比那些照搬套用的东西更难理解，更难接受了。



## 六、“正名”与“正实”

### 1、中文从概念入手

*Earthbound China* 关于中国工业传统和特点的阐述，主要安排在该书的“结论”部分，其基本内容，主要来自中文版“易村手工业”部分的序，但是在表述方式上做了很多重要的改变，对整个内容作了很大调整。

中文版序是从张之毅先生的一些个人故事和具体研究过程的描述开始的，有很强的个人回忆色彩，而正文部分，则从分析和修正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工业”、“农业”这些概念入手，重新构建关于工农关系的概念<sup>1</sup>。这种“正名”，符合中国读者的思维习惯，同时也抓住了这个问题在中国语境下的关键点。鉴于中国一般读者特定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框架，这种对于基本分类、范畴和概念的修正，切中要害，最简捷地直达人们误区之所在，直接解构中国读者的常规思维。

中文版中修正的这两个概念，都是典型的中国人引自西方的概念，本来都是舶来品，而中国人的问题，在于反过来套用人们想象中的这些概念“西方语义”，裁剪现实，构建关于本土的知识，造成了费孝通等人认为的“问题”。因此，费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主张，中国人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要回归到一些事实的基本面；在引进和运用西方概念时（比如“工业”、“农业”时），要真正用来概括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这种“现实”，应该是基于实际调查，而不是想当然的。实际研究表明，中国与西方即使有某些看似类似的情况，也不能简单套用理论，而需要深入的实地研究来确认这种相似性的真实意义。比如中国乡村的工业化，如果仅仅看表面的大致情况，与西方工业化历史也有共性，但越是这样，越需要更加警惕。作为社会学者，特别需要注意防止的是这类任职的陷阱。简单套用或误用西方概念，不但不能更好地概括和解释中国现实，反而可能妨碍自己对于中国社会更有价值的认知。

一般而言，中国的很多问题，不是出自基本事实本身，而是源于西方话语霸权下，国人对于某些非本土范畴的盲从、误读和纠缠，形成自我误导，造成人们对某些明显的、简单的事实视而不见，或忽视或曲解，所以“正名”常常显得非常重要。这种正名，其实不过是鼓起勇气打破常规回归那些基本事件和感受本身，它最容易实现的场景，就是田野研究。

### 2、面向西方的表述

在对英语读者的表述中，费先生从基本数据和事实入手开始阐述，而不是像在中文版中从概念入手。因为西方总体的强势地位，社会科学概念本来就源自西方一般用语，对他们而言不是舶来品，不是新概念，没有特别的原则性或神主牌式的光环，也就没有了那种关系到解释权的不可动摇的语义迷信；这样的语境下，人们一定程度上反而更容易改变对某一概念的定义——只要你列出确凿的事实证据，人们就会对原有概念进行某些修正，不必受到非西方国家各种“西方崇拜”造成的心理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西方，问题不在于正名，而在于“正实”，主要是清楚明白地交待事实。在英文版中，费先生在简单陈述了中国学者的治学态度和学术价值之后，就开始直接引用数据，展开讨论，展示中国农村农民收入中各种来源的比例，用数字说话。对于没有中国背景知识的英美读者来说，数字表达最为清楚明白，一目了然，尽管信息不够完全，但至少可以告诉他们一些基本事实，数字毕竟是世界通用的语言。

### 3、坦诚的本土关怀

在三村研究报告的中文版和英文版中，费孝通先生都从中国和西方关系的大背景下阐述了中国农民在面对西方工业冲击下不断恶化的状况，但是在《云南三村》中，费先生是面对中国内部的读者，侧重于以农民的视角和立场叙述的，也具有一定感性的成分。但因为是针对国内读者，反而不需要太多强调农民艰辛的一面，因为这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基本常识，所以中文版更多谈到农村贫困化的机制成因，包括特别阐述了国外工业的特权、西方经济侵略、以及这些变化导致中

<sup>1</sup>费孝通、张之毅，1990，《云南三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08-212页。



国国内政治不安等问题，而对抗战期间中国的状况和抗战之后中国重建的建言，完全是站在“我群体”内部的中国本位的立场上说话。

而在英文版中，叙述着的身份、语境、对象、场景都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中国学者，面对西方公众，那种表述者和读者之间自然而然的心心相通的情感没有了，共同的国家民族认同并不存在。叙述者个人超越地域文化的“全球化”的身份被强化，特别是在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下，单一的学者身份和表述，更容易为人所理解，也更省去一些不必要的繁复的解释……所以英文版在探讨同一问题的时候，则更多地从一种中立的观察和研究者的角度，语气比较“客观”。

然而，这种客观，并不意味着阐述力度的弱化，事实上，由于“中立”的立场，在某些情况下，对于某些问题的强调，更为有力，文中很多简单直白的阐述，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学者对西方学术界发出的最中国的话语之一。比如在谈到西方工业冲击下的中国农民的状况时，作者说，中国农民“不管他们有多好的技艺，他们都是在跟机器打一场注定失败战争，但他们必须一致打下去，否则，就无法生存……”<sup>1</sup>这类表述，可以说振聋发聩。又比如，“……其结果是，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农业国，纯粹而单纯，而一个农业的中国，不可避免地是一个饥饿的中国。”<sup>2</sup>这种言简意赅又独树一帜的表述，对西方读者具有特殊的冲击效果，因为它与一般西方关于“中国”的联想——比如农业国、农业生产、农业发展意味着富足——不一样，“看起来，指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农民能完全依靠农业过活，是不切实际的”<sup>3</sup>。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费孝通先生坦诚地宣称，在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理想类型”的工业，不是“最有效率”的工业，我们关心的是一种现实实用的、适合广大农民大众情景的工业类型，因为中国的新工业化，如果简单采用欧美的工业化模式，将会导致中国农村的严重危机，而中国农村如果不能从工业化中受益，也会大大影响中国国内的市场……<sup>4</sup>（英文版没有强调中文版中提到的政治问题）。这些表述，在今天遭遇“三农”困境的中国听来，仿佛是在讲述当下面临的问题和困惑，完全没有60年的时空差距！这种持久的效力，与其说是源于观点的特异，不如说是一种真正立足现实、超然于东西方既成思想之上的思路，以及背后彻底独立的学术价值。

遗憾的是，费孝通等人当时这种忧患和预言，后来一度成为我们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事实，等于实际上从反面验证了这些命题，尽管事实上我们并不希望这种“应验”。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等学人的这种思路，从30、40年代的江村、三村研究，到50年代的重返江村，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学重建中的乡镇企业、小城镇研究，到80、90年代的区域模式研究、城乡协调发展研究等，直到近年来的文化自觉、文明关系研究以及微观城市社区研究等等，六七十年一贯至今，基本上没有实质变化，而不断变幻的，是中国社会，一直在不同模式之间摆动，中间进行了多少尝试、挫折和成就，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事实上却在不断从正面和反面验证这些思路的有效性和前瞻性，已经被证明是真正具有洞察力、先见之明和透析中国深层社会状况的。

## 七、学术价值

*Earthbound China* 中对于中国学者和学术界价值理念的阐述，是跨文化学术表达的重要基础，在谈及他本人和他的同事们对这三村研究的目的时，费孝通先生强调了两点：“实际”（practical）和“未来”（future）<sup>5</sup>。

### 1. 学以致用

在当时社会情境下，中国学者毫不回避自己研究的目的在于帮助决策者制定实际政策，这是优化农民生活的实际行动：

<sup>1</sup> Fei Hsiao-tung, 1975,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Midway Reprint. 305 页

<sup>2</sup> Fei Hsiao-tung, 1975,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Midway Reprint. 305 页

<sup>3</sup> Fei Hsiao-tung, 1975,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Midway Reprint. 308 页

<sup>4</sup> Fei Hsiao-tung, 1975,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Midway Reprint. 308 页

<sup>5</sup> Fei Hsiao-tung, 1975,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Midway Reprint. 297 页



“……定义的效度，要靠随之进行的行动来检验。对我们来说，把科学研究和实际政策联系起来，是合理合法的，甚至是根本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sup>1</sup>

这种鲜明的应用取向的学术价值——公开宣称为影响政治决策而从事研究——具有浓厚和鲜明的中国特点，与中国近现代特有的遭遇和国情密切相连。它与西方一般的学术习惯还是有相当大的不同。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不管什么意识形态，不管什么学科，不管什么学派，其基本的目的，都是探索国家民族的自强之路，这是一种超越学术活动本身的价值取向，它已经构成中国学术的一个基础，30、40年代敌机轰炸下魁阁学人执着的学术努力，正是这种价值的一个最好的缩影，而费孝通先生面对西方读者明确宣示这种学术价值，有利于西方学者和读者理解中国各种学术思路背后更具决定作用的“世道人心”。

## 2、意义在于未来

费孝通在全书的“结论”中一开始就说明，社会学田野工作，始于假设，终于假设，我们只是为未来开题，随时准备根据新的证据来修正……<sup>2</sup> 换言之，是说三村研究当时的成果并不是最后的结论，它只是为未来更深入地研究的一种铺垫，犹如所谓“抛砖引玉”。这种“谦逊”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西方公众和学术界接受程度的考虑。鉴于当时西方社会学研究相对来说比中国要成熟很多，这种完全基于中国经验、但又在学科属性上源自西方的学术成果，面临一种两难的处境：作为总体上“不成熟”的、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学术，究竟有没有能力向国际学术界提出一些不同于西方基本分类、基本概念、基本范畴的新的概念和框架？这种新的思路，如何表达，如何沟通，如何介绍到国际学术界中去？这种表达，必须不失原意和立场，但又用别人听得懂、能接受的语言，不能完全流于独白式的自言自语……这种两难，不仅是费孝通在 *Earthbound China* 中要面对的，也是中国学术总体上的一种悖论。费孝通的“翻译”实践，可以作为突破这一学术重围的早期经典的经验。

## 八、结语

费孝通先生80多年的学术生涯，一直是在中国学术和西方-国际学术之间，构建沟通理解之桥。他所面临的问题、境遇和所作的努力，已经载入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一般社会思想的史册。不断重温、解读和反思这些重要的经验，是一门很好的功课，有助于我们直面当前和未来挑战。费孝通在 *Earthbound China* 的前言中说：“对于东方知识的需求正在增长……东西方不可能再孤立地生存……但是密切的联系，如果没有深切的理解，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灾难”<sup>3</sup>，和平共处和互相尊重需要一种互相理解。民族之间要想彼此宽容、同情和帮助，就必须具备关于对方“如何生活”、“问题何在”等等基本的知识。而学术工作，可以承担这种传递知识、交流沟通的重要任务。但这种交流，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也是一项艰辛的使命。如果说，三村研究揭示了中国乡村面对西方工业时的特殊处境，中国学术，又何尝不是面临同样的困惑与挑战？如何在这种格局中确立自己的自主性，以一种合适的方式面向世界，这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理念，也是一系列具体的操作化的行动，不管怎样，“让我们承认，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sup>4</sup>。

1 Fei Hsiao-tung, 1975,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Midway Reprint. 297 页

2 Fei Hsiao-tung, 1975,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Midway Reprint. vii 页

3 Fei Hsiao-tung, 1975,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Midway Reprint. 313 页

<sup>1</sup> Fei Hsiao-tung, 1975,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Midway Reprint. 297 页

